

《通天塔》中文化霸权的经济解读

熊欣

(湖南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 湖南 常德 415000)

摘要: 伊纳里图执导的影片《通天塔》揭示的绝不仅仅是语言的隔膜造成的沟通的失败, 还有其背后的根本原因——经济发展差异。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关乎其文化心理, 而一个群体的文化心理必然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对社会财富掌控的多少紧密相关。世界本就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且具有广泛差异性的复合体, 只有经济地位 and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等, 不存在文化的优劣高低。经济基础决定着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性质和价值取向, 强势经济必然带来文化霸权的繁衍。

关键词: 《通天塔》; 经济基础; 霸权文化; 解读

中图分类号: G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106(2014)01-0119-05

An Economic Approach to Cultural Hegemony in *Babel*

XIONG Xin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Changde Hunan 4150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film *Babel* directed by 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 it is proved that people's different economic status in the world results in the failure of the communication, but not only due to the different languages. The power of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in a group,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understanding each other,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spective social economic positions and the possession of the wealth. The disequilibrium and the enormous differenc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level is the fact of the world which only produces the inequality of the economic status and its development, but not the quality of cultures. As one kind of the superstructur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value orientation of culture are dependent on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Dominance in economy absolutely leads to the prevalence of cultural hegemony.

Key words: *Babel*; economic foundation; cultural hegemony; interpretation

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在本文中指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意识型态及文化内涵的主宰, 通过控制其文化价值取向和建立重要习俗以统一意见来达到支配的目的。文化霸权虽然需要超越经济阶段, 体现出一种精神和道德的统治,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抛弃经济基础, 与经济基础割裂开来。文化霸权同时也必须属于经济的范畴, 必须以主导群体在根本的经济活动中所执行的决定性职能为基础。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 文化霸权

又是一项全面的统治工程, 既是一个文化或政治的问题, 也是一个经济问题。西方文化霸权就是典型的普世主义文化主张。其核心就在于凭借经济实力、科技优势和政治影响, 将文化的全球性归结于西方文化的普世性, 不承认西方文化的相对性(相对性的含义在于, 不同民族与地域的差别, 决定了人们生存环境、历史进程与文化特质的不同, 由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生态, 诸多文化价值总是相对于特定民族、地域而言才具有实际意

收稿日期: 2013-03-01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课题(11JC0896); 2014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熊欣, 湖南常德人。湖南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研究方向: 英语语言文化与翻译。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义);拒绝承认非西方文化的普世性价值,只承认其相对性^[1]。在文化价值评价问题上执行双重标准,是西方文化霸权内在的基本特征。

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 1963)导演的电影Babel《通天塔》片名是根据《圣经·创世纪》中人们建造通天之塔的典故得来。“Babel”一词在巴比伦语中意为“神的门”(gate of god),而在希伯来语和英语的引申义中是“喧闹、混乱和含糊不清”(scene of noisy talking and confusion)。这样一来巴比伦人眼中神圣的塔庙在以色列等外人心中变成了骄横傲慢的象征,只会带给人类审判和惩罚^[2]。大多数人把电影的主题定位在沟通,把人们之间冲突和沟通的失败归咎于交往中的语言差异。美国学者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其著作《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一书中梳理了古今中外的各种交流理念,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永远不能像天使一样完美地交流,我们能做的是交流时多些爱心和宽容^[3]。从而把失败的沟通归结于交流过程中爱和宽容的缺失。积极、宽容和充满爱心的交流确实可以突破沟通的困境,消除某些文化的隔阂与偏见。目前国内对于影片的解读仍然局限在隔阂和沟通主题,没有更深地对产生语言与文化差异的历史和经济根源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一、经济基础决定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语言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具体反映^[4]。经济基础决定着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一定的语言和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所决定,有什么样的经济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和语言,试图建立逾越经济发展历史阶段的文化思想就像空中楼阁,是注定要失败的。文化作为整个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确立,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经济对文化的影响是通过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来间接作用的。

影片Babel要表现的决非仅仅是语言的隔膜,展示在观众面前的更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表面上,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不通,导致了通天塔的倒掉。实际上是由于生活习俗,收入水平等因素导致的人与人之间心灵上的隔阂,更加残酷。影片中,通过当地导游的翻译,美国游客与摩洛哥山民之间并未因为语言的差异而构成任何的沟通障碍,完全可以“翻译”这一媒质实现语言

的沟通;两个美国小孩儿,德比娅(Debbie)和迈克(Mike),也可以通过保姆亚米妮娅(Amelia)了解到墨西哥当地的风俗民情。其实沟通和交流的媒介决不仅限于单纯的言语和语言,日本聋哑女孩儿千惠子可以通过手语、姿态语言和便笺与人交流,能够通过对方法说话时口型读懂对方的语言。从整部影片来看,无论是同一语言环境还是不同语言环境下的人们,纯语言差异所造成的沟通障碍是微乎其微的;事实上,人们相互之间所做的交流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和心灵的沟通。如果缺乏对他文化的心理认同,即使在同一语言群体内也会因为相互间的不理解而咫尺千里。从影片的表层来看,导演所想表达的似乎也是因为语言差异而造成的人们之间沟通与文化的障碍。诚然,语言差异和文化心理的认同确实在人们相互的理解和沟通中扮演着必不可少、举足轻重的角色。但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冲突的根源在于经济上所处位置的不对等,也正是这种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所处不同位置的差异性导致了各不同经济阶层之间文化心理需求的差异,从而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充分沟通和理解的缺失和失败。

二、强势经济导致霸权文化的泛滥

《圣经》“创世纪”第十一章中通天塔(Babel)的缔造者们利用砖石和上帝赐给人的理性、智慧和聪明,甚至是手中的权利来宣扬人自己的“名”并一窥“天堂”的奥秘,凯觐上帝的荣耀,而正是这种“名”隐喻了人类自身的“劣根性”,即贪婪以及对自然法则的违背和权势以及暴力的滥用^[5]。今日我们身处一个多元化乃至全球化的时代。而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似乎使我们的世界缩小了。人类的和谐共生、共同发展需要的既不是权力和话语霸权,也不是空洞的真理和爱,它需要实实在在的在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世界已经缩成了一个小小的屋檐,人类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语言不再是互相沟通的障碍,将人类彼此隔离开的是因经济地位的差异所导致的某些陈腐的观念和偏见。人类以高科技为标志的高度文明却又正在不断地割裂人们之间的亲密无间和彼此信任,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的文化差异对人们影响深远,使每个人的内心成为一座座的孤岛。美国是经济和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他们总是让暴力和

血腥远离他们的孩子,所以当德比娅(Debbie)和迈克(Mike)看到杀鸡的场面时会感到如此的惊吓和内心的震撼^[6];墨西哥是一个欠发达的国家,正是科技经济的落后使得这些生活在贫穷中的孩子们对发生在他们周围的血腥和暴力事件习以为常,他们认为如此杀鸡的方法是个很平常的事情并且乐于参与其中。但如此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墨西哥当地文化却更加真实地反映出人性之本真和朴实。如果此时用大国强势文化来取代之,则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最终导致不同文化群落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

强势经济条件下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凭借其经济和科技上的绝对优势,积极拓展、甚至谋求垄断世界思想文化市场,控制世界思想文化资源,如此所产生的某种强势或者说霸权文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全球霸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的霸权文化在其现实性上,并不一定是先进文化,也不一定是优秀文化,而且还可能是落后文化,甚至是具有某种劣根性的文化。它可能会拒绝改变,抗拒服从,甚或妄自尊大,唯我独尊。一个历史阶段的霸权文化未必就注定了弱势文化的消亡,每一种文化都是一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产物,它有其自身存在的道理和理据并处在永远的动态变化中,对经济的发展有着反制作用。也许某一天另外一种强势经济选择了彼时的“弱势文化”,那么它是否也就成为了今天的“霸权文化”呢?

美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先进性源于其国内经济的飞速发展,美国的强势文化心理亦源于其优势的世界经济地位。经济上的强势造成了美国人民心中存有对其他处于弱势经济地位的国家 and 民族的一种强烈的文化心理偏见。正是美国人的这种心理优势感导致了影片中持续的沟通障碍并不断膨胀、升级。其它国家的人对其反感的原因不是其国家的优越性和领先性,而是它那种赤裸裸的强行要你接收的姿态,影片中一次纯粹的意外枪击事件被美国政府强行钉上恐怖的标签便是明证。这的确是难以忍受的,就算你最好,可你也没有权利来要求别人接受你的好。影片中,导演通过摩洛哥人和墨西哥人眼中那代表财富和机遇的“美国”自大而容不得半点的挑衅的形象展示,淋漓尽致地反映出了美国强势经济和霸权文化下所掩盖的冷酷、残忍和威胁。

三、经济差异导致文化隔阂和冲突的不断加剧

经济差异包括财富差异、经济利益差异和自然资源差异等,但也同时体现在语言文化和社会评价机制的差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政治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承载着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似乎很近,但又很远。人与人之间关联的脆弱性以及可怕的令人窒息的理念的隔阂是人类生存处境中最大的悲哀,它揭示出了种族和文化间因为经济差异所产生的深深的隔膜和不信任,直击人性的无知、冷漠和自以为是,这是比语言和文化的隔阂更让人绝望的事情^[7]。正是人们处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架构中,所以事事从自身利益出发,以自我为中心。当人以自己的智慧和理性来衡量事物及认识真理的时候,常以自身为标杆来分别善恶,滥用理性和权柄,看不到人类在目前环境下需要的是经济和文化的融和而不是藩篱。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导致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及语言等方面的差异,所以霸权文化群体对弱势文化群体的无形压迫必将严重阻碍到其间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最终带来跨文化交流中的种种悲剧。影片中美国孩子德比娅(Debbie)和迈克(Mike)由墨西哥保姆亚米莉亚(Amelia)带着乘上桑地亚戈(Santiago)破旧的汽车进入墨西哥小镇后,他们好奇地瞪大眼睛看着车窗外那陌生的世界:粗犷黝黑的面孔,奇形怪状而又破败不堪的建筑,成堆报废的破旧车辆以及那完全异样的反主流色彩和另类的让人不安的喧嚣,所有的一切都令他们感到如此的忐忑。从媒体和母亲那得到的一切关于墨西哥的说教:“危险”(“Mexico is really dangerous!”)更加深了他们对这个陌生的贫穷国度的厌恶:“I don't like Mexico!”。至此,孩子们内心关于墨西哥的这种负面形象和对此异域文化的抵触不再完全源于他们母亲思想的灌输了。这种经济发展落后导致的墨西哥的贫穷和落后在孩子们的心中更加深了美国文化和墨西哥文化的隔阂与冲突^[5]。霸权文化和弱势文化的对垒反过来也常常使得跨文化传播成为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争霸场。拥有优势政治、经济地位与传播手段的文化体(如美国)享有着世界文化的霸权,在其全球经济的大肆扩张和文化入侵中必将造成弱势经济体所代表的弱势文化被逐步同化,甚至被霸权文化所取代,以至于最终被人为地消灭。

各种文化自身并没有冲突,现实世界中的文化冲突实质上缘自各经济实体之间的不均衡发展。国际经济新秩序下,资本全球化更加导致了财富分配的失衡。像摩洛哥等第三世界国家永远处于社会框架的金字塔的最底层。影片中摩洛哥人和墨西哥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伊斯兰文化和拉美文化,在美国人眼中都是落后甚至是野蛮的,由此导致经济高速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无形对抗。影片借助美国游客在摩洛哥的反应和进入墨西哥的美国儿童的眼神以及美国媒体的报道,导演将美国民众对伊斯兰文化、拉美文化的恐惧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他们给摩洛哥人、墨西哥人贴上“恐怖分子”、“非法移民”的标签,将伊斯兰文化和拉美文化视为“危险的”、“不洁净的”^[8]。

正如人人生来平等一样,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各种文化本身是平等的,它们相互之间只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性,但从根本上来说不存在优劣高低之分。造成各民族间偏见和歧视的原因除了语言和文化差异以及政治体制不同外,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们所处经济地位的差异和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均衡以及拥有社会财富程度不同。

四、经济多元与文化多元的正确认知

世界本就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且具有广泛差异性的复合体,经济差异衍生出来的多种多样的文化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形成我们如今生活着的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在当今世界政治多极、经济和文化多元的格局里,人们应该认识到各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才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而文化也只有在多元化的状态下才能显示出它非凡的魅力和意义,才有可能为人类的想象力提供新的空间和动力。影片中美国夫妇一家和日本父女俩的生活与墨西哥乡村人民的生活状态和经济状况的差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美国和日本这样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人们表面生活的富丽堂皇,但内心得不到安宁与和谐;而与美国相邻的墨西哥和千里之外的摩洛哥,处在社会经济底层的当地人却过着田园般的生活^[9],享受着自身所特有的文化氛围,从而使物质的简单与生活的满足形成鲜明的对比。

影片展现了美国凭借作为第一大经济实体的优势,试图保有自己的话语权威,以为自己所属的文化群体优于其他文化群体,使用群体所赋予的文化价值去透视观察“他者”,不断强迫他国接受

其文化和价值观念,不愿意反思自身的文化,荒诞地扮演着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警察的角色,无法与多元文化的世界和谐相处。美国的这种权威话语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即西方沙文主义,它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不自觉的前提。影片中表现在中枪的美国夫妇对于落后的地区和人民所怀有的那种深入骨髓的傲慢^[10]。权威如果不是建立在平等地运用法律和条例的基础上,冲突的可能性就不可能减少,就免不了霸权文化的进一步扩张,那样将会有更多的像影片中的摩洛哥男孩儿那样为此失去宝贵的生命。任何经济阶层、任何发达与不发达国家都拥有他人所不具备的自身文化精华^[11]。民族中心主义和民族偏见都是错误的。从辩证的观点来看,得到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失去。美国在获得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地位和文化警察身份的同时,也在破坏世界经济社会的和谐与共生。

影片中处在上帝制造的隔膜和“变乱”中的美国人自己其实也是受害者,他们在给别人带去压力和紧张的同时,也同样为自身所失去的安全感而恐惧和焦虑。影片始终笼罩着一层厚重的“逃离”的焦灼氛围,他们在摩洛哥看到当地村民时是如此害怕,想赶紧逃走,甚至恐慌到要抛下他们的同胞。这种“逃离”的恐惧其实是普遍存在于现实的美国人的心中^[12]。美国作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体,美国人及美国政府不可避免有着一一种“大美国”倾向,因经济强势衍生出强势的文化野心(霸权文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发展失衡所产生的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距,用自己的文化标准为评判一切文化优劣的标准,将自己的文化模式看成普世的、终极的文化,以一种宗主国式的权威话语方式将其文化精神、价值观念、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等强行灌输给第三世界国家,如此便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文化间的摩擦和争端。

五、结 语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服务于经济基础。美国经济霸权否认国际经济法中的经济主权原则,否认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经济主权,从而决定了其文化霸权的必然性;反过来,美国文化霸权的发展又为其经济霸权“助桀为虐”。

不同国家、不同种族和不同语言的人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过程中,只有具备了经济的平衡发展,构建起一种全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本着

相互理解和相互宽容的心态,才有可能做到取他文化之精华去自身文化世俗之糟粕,消除文化壁垒。美国在进行的文化侵略和扩张的过程中,大力宣扬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鼓吹西化,归根结底是为了经济上的利益,是为了维护其经济霸权。只有在实现了经济共同繁荣的条件下,各文化的和谐共生、种族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沟通,才能获取影片中那“最亮的光”,才能渡过那充斥着隔阂与冲突的“最暗的夜”。

参考文献:

- [1] 赵宗博. 文化霸权问题[N]. <http://blog.sina.com.cn/s/blog>, 2008-04-04.
- [2] 吴立斌. 对“巴别塔事件”的评鉴性研究[J]. 金陵神学志, 2010(2): 90-110.
- [3] [美] 彼得·斯著, 何道宽译. 交流的无奈: 传播思想史[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 24.
- [4] LARRY A SAMOVAR, RICHARD E PORTER, LISA A STEFANI.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 [5] [美] 马歇尔·米·斯纳著. 霍布斯[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62-66.
- [6] 熊欣. 伊纳里图《通天塔》的“隔阂”叙事[J]. 求索, 2012, (6): 95-96.
- [7] 朱晓兰. 浅论电影《巴别塔》的人文关怀[J]. 电影评介, 2008(7): 48.
- [8] 谢新华, 李思明. 《通天塔》: 文化中的家、国与天下[J]. 电影评介, 2008, (5): 44-45.
- [9] 沈蔚. 心灵的隔膜与跨文化沟通的无奈——影片《通天塔》主题透视[J]. 电影评介, 2007, (23): 62-63.
- [10] 岳莹. 从电影《通天塔》看文化冲突对社会建构的意义[J]. 电影评介, 2008, (4): 39-40.
- [11] RUSCHER J. Prejudiced Communication[M]. New York: Guilford, 2001.
- [12] 张晶, 于淑静. 解析《巴别塔》中的隐蔽文化[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8, (1): 118-120.
- [13] GUDYKUNST W B. Cross-Cultur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M].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2003.

(责任编辑: 张雅秋)

(上接第 106 页)

一是在观念层面, 由于社会转型, 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趋势, 需要通过基本刑事政策中社会治理的思想, 对全社会进行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引导, 发挥其引导功能; 另一方面, 在技术层面, 刑事政策将显著体现“政策”优势, 最大范围、更有效地调动社会积极性, 使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刑事犯罪的社会治理当中, 构筑坚固的社会防控体系。

参考文献:

- [1] 柳忠卫. 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模式探析[J]. 刑法论丛, 2010, (2): 524-525.
- [2] 张旭. 刑事政策、刑法学和犯罪学三者关系的梳理与探究[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9(2): 156.
- [3] 储槐植. 刑事一体化[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4: 256-268.
- [4] 张旭, 单勇. 犯罪学基本理论研究[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147.
- [5] 侯宏林. 刑事政策的价值分析[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93.
- [6] 郭理蓉. 刑罚政策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8: 15-16.
- [7] 王仲芳. 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89: 461-462.
- [8] 李卫红. 刑事政策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08-209.
- [9] 刘建宏. 犯罪功能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2.
- [10] 严励. 刑事政策的价值目标——刑事政策的理性思辨之一[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3, (5): 112.
- [11] 严励. 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的探讨——刑事政策模式研究之三[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6): 63.
- [12] 邓文莉. “两极化”刑事政策下的刑罚制度改革设想[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2007, (3): 117-119.
- [13] 翟中东. 中国社会转型与刑事政策调整[J]. 学术论坛, 2003, (1): 45-50.
- [14] 卢建平. 刑事政策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336-337.

(责任编辑: 刘 越)